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北流亡文学作家论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研究卷

滕贞甫
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 编 张福贵
研究卷主编 韩春燕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东北流亡文学作家论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研究卷

滕贞甫
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主 编 张福贵
研究卷主编 韩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流亡文学作家论 / 滕贞甫编. — 沈阳: 春风
文艺出版社, 2019.11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
ISBN 978-7-5313-5647-9

I. ①东… II. ①滕…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东北
地区—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80034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姚宏越 刘 维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封面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55mm × 230mm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5647-9

定 价: 4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穆木天：隐秘的在场者	贺 颖 / 001
风中的萧军	高海涛 / 026
阅读罗烽	张 翠 / 035
现代诗学理想与萧红的跨文体写作	吴玉杰 / 047
永远三十一岁的前辈	刘兆林 / 086
白朗：俯首苍茫桑梓地 笔走风云半世惊	韩春燕 / 100
文事沧桑 百年端木	张 英 / 109
端木蕻良：他是大地的孩子	薛 涛 / 128
人民的作家，舒群	王 科 / 136
倔强与执着	周建新 / 152
骆宾基的小说世界	谢淑玲 / 161
与我们对他的景仰一道不朽	刘嘉陵 / 194

穆木天：隐秘的在场者

贺 颖

—

“东北流亡作家”以一个饱含美学意义的特有名词，享誉现当代中外文坛；以“最早投身抗战文学的一个群体”，昭示一种不容现代文学史忽视的客观存在；以文学与时代的双重审美，成就了近一个世纪经典的文学传统，这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特别的作家群体，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为旗挥领人民、以文为剑守家卫国的历程，已然成为历史上炽灼的光荣与梦想，而穆木天作为东北流亡作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令人慰藉的精神丰碑。作为今天任何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东北作者，东北流亡作家所赋予后人的，已然不仅仅是曾经客观发生的一切，而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近乎血脉深处的疼痛与冲撞、安谧与流转，是仿佛更深刻的一种秘密召唤。也许只因为身体里流动着一样的北方的血，也唯有如此，才得以于东北流亡作家的浩浩作品中，获取宝贵的阅读与审美体验。

东北流亡作家指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其作品

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呈现了东北大野上的深沉热烈的爱恨情仇。提到东北流亡作家，大家都会想到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几位代表人物，而有一个名字绝不该被轻视或遗忘，因为他称得上这一群体的第一人、东北流亡作家的文化先驱与革命勇士：穆木天。

穆木天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革命诗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穆木天1900年3月26日生于吉林省伊通县靠山镇护山村的一个富足家庭，原名穆敬熙。在他祖父的时代，穆家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富户，后来后人不着正务，导致家境黯淡败落。他们这一支，幸有亲人邻里帮衬，得以再次把家业兴盛起来。正是从这时候起，得益于较好的生活境遇，穆木天开始了弥足珍贵的启蒙教育。1909年他入读私塾开始学习，他年纪小，却仿佛知晓自己的使命，格外用功研读，1914年毕业于伊通县立第一小学，1915年入吉林省立中学，后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并于1916年加入由周恩来发起成立的“敬业乐群会”，做了该会学报的编辑。1919年他留学日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次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1年在京都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发起人之一。1923年4月，穆木天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法国文学，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艺术启蒙。1921年他开始诗歌创作，早期诗风深受法国象征派影响。象征主义肇始于19世纪的法国，其理论和创作对我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影响。被中国学者公认为象征主义鼻祖的波德莱尔，更是在颓废的情感基调、应和的诗歌理论，以及现代的诗歌题材等方面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产生很深刻的影响。中国诗歌的象征诗派内部显然有着更为丰富多元化的结构，不一致性是其始终存在的内在符号之一。波德莱尔作为法国象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其理论的创建者，对20世纪初中国诗坛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有重大影响。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学习法国文学，对

法国象征主义有着自己独特深入的认知，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成就，都对现代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可能。其间他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及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并翻译出版了王尔德的《自私的巨人》《王尔德童话》等译著，创作了《水声》《雨后》《雨丝》《苍白的钟声》等极具象征主义特质的诗歌作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他的诗歌格外注重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基调忧郁而感伤。关于象征主义，他提出了“纯粹诗歌”的概念，他认为诗应该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直至作者幽暗的潜意识深处，从而传递出对外部世界的繁复认知。这一点在他1926年1月《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他的表述最为清晰而坚定，他坚持“诗不是说明的，诗是表现的”“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性”等观点，也因此奠定了他的中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以及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地位。

1926年穆木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执教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院等学校。1929年他毅然回到家乡，在刚刚创建不久的吉林大学任教。历史的车轮此刻正行驶在一个悲壮的节点，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军阀的统治腐朽枯败，一派摇摇欲坠的危急态势。此时的穆木天以一个文人的良知与勇气，坚持向学生介绍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宣扬新思想，勇敢抨击腐朽的时政，主讲名著选读等课程，更加侧重对学生创作的指导，并写下了《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十月之歌》等诗，却终于遗憾落败于政治的粗暴与黑暗，于1930年年底被校方解聘。1931年，穆木天辗转来到上海，经过对时政的审视考量，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负责诗歌组的工作。当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旗帜人物是鲁迅，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促进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此文学组织的目的是与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等。1932年9月，穆木天与任钧、杨骚等

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提倡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并于1933年2月创办了《新诗歌》杂志。这一时期，穆木天写出了《在哈拉巴岭上》《守堤者》《扫射》等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的全新风格的诗歌，并因为表达技术上的改变，被后人认为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战火烽烟的1937年，穆木天因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舆论的压力下，于同年9月被释放。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撤退到武汉，与杜谈、柳倩、蒋锡金等人成立了时调社，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到群众中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继续为实现中国诗歌会的宗旨而挥动旗帜，并于时代的风云中坚持书写，创作了一些关于诗歌理论的文章，以及十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穆木天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和《抗战文艺》编委。次年到中山大学，因抗议学校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于1942年愤然辞去教职，到桂林任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不久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其间所创作的《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二十七年了》等诗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被迫离开桂林城，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同时致力于进步文化工作。此间穆木天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并著有《旅心》（1927）、《流亡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等诗集，这些作品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历程与对生命的不息探求，也传递出时代与历史的律动。1949年9月，穆木天回到长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调往北京师范大学，任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他对这两个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大胆严谨的实践，对这两个学科的教学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穆木天于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71年10月含冤病故。

穆木天的文学活动涉猎范围很广，他著有《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怎样学习诗歌》《法国文学史》《穆木天诗选》《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徐志摩论》《什么是象征主义》《维尼及其诗歌》《诗歌朗读与诗歌大众化》等诗论文章，同时创作了《江雪》《水声》《雨后》

《落花》《苏武》《七年的流亡》等一批在现代新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作品。他的诗论代表作《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是许多现代诗论的选本所无法回避的经典，已经广为人知并为学界所推崇。他的翻译作品，更是今天的经典译本，当时的译作有《青年烧炭党》《初恋》《青铜骑士》《欧贞尼·葛郎代》（今通译《欧也妮·葛朗台》）《从妹贝德》《巴尔扎克短篇集》，他同时通晓法语、日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一生翻译的文学作品共近一百二十种，其中包括王尔德、普希金、雨果、巴尔扎克等世界文学名家的名篇，他翻译的《欧贞尼·葛郎代》、《勾利尤老头子》（今通译《高老头》）是最早的汉译本，至今仍为珍品。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一直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较，学界甚至对他生平及他文学创作活动的史料搜集和整理都有很多欠缺，尤其是关于他早年活动的一些材料更是所知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切遗憾。他不只是新文学时期著名的诗人、卓越的诗歌活动家以及文学翻译家，更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这在文学史上绝不是泛泛可见的现象，他的诗集《旅心》被读者与学界公认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作为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诗歌至今仍广泛流传。穆木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深有影响、极有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毕生对祖国和人民满怀情感，对文学艺术满怀炽爱，而对腐朽的统治者、对卑劣的侵略者满怀刻骨仇恨，并以手中的笔为剑、心中的思想为旗，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先驱。

潘颂德在《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中说：“穆木天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歌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自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

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①

1926年3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创造社重要成员穆木天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关于诗歌的通信《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以下简称《谭诗》），这是为今天的读者与学界所甚为熟知的穆木天的代表作之一，是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将自己的思考与西方现代诗歌理念进行充分融会的深度的诗学思考。以当时而言，穆木天写这封信的初衷，也许仅是谈谈“对诗近来的看法”，而其运笔的姿态也只是“杂乱谈我的感想”，可未曾想到若干年后，这篇杂感却成为研究穆木天诗学理论最为关键与核心理论依照。穆木天作为中国象征诗学理论王国的奠基者之一，长期以来却奇异地消失于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应该说，在今天深入探究穆木天的诗学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穆木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同样极具意义与价值。《谭诗》是穆木天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中的“纯诗”概念引进了中国诗坛，也因此被后人称作“反驳诗歌‘散文化’的利器”。穆木天以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为参照，缜密系统而又自由洒脱地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象征主义诗学观，无愧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理论的文学先驱。

《谭诗》是以“纯诗”为理论核心并从“纯诗理论提出的现实动因”“纯诗定义”“实现‘纯诗’理想的要求”等几个主要方面衍生的一个诗学思考体系。今天看来，《谭诗》在理论建构上尚有些许不足之处，而在当时的时代及文学背景下，穆木天以它对当时诗坛现状所做出的最初的深刻思考，是有着不可超越的文学史的美学意义的。“纯诗”是与西方象征主义一贯坚持的艺术自主性、强调诗歌语言的

^① 潘颂德. 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 [J]. 东疆学刊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1).

暗示性及音乐性息息相通的，并带有超验主义色彩的概念，它基本上贯穿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兴起发展的全部历程。穆木天以独到的视野与勇气，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超然思想，从异域文化的象征主义的理念出发，对自己认知中的现代新诗做以深刻的阐释，表现对文学艺术的一种非凡的探索精神，思维缜密、真挚、恳切而又自由有力。

他大力倡导诗歌的纯粹性，力求呈现“自然的并非是纯粹的”等系列艺术理想，同时借鉴了一些象征主义理论家关于“诗歌世界”和“散文世界”本质相区别的理论探讨的诸多成果，尤其是这些作品中共同指向的，对于诗歌意义之外的表现样式的精神关照。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其文本的具体论述中，穆木天事实上有着巧妙的表达技术。因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行文中其实一直在以微妙的叙述逻辑，或抹去或移除了象征主义中过于符号化的超验主义色彩，这是更为大胆而自信的，后来的研究者一致倾向这来源于辰野隆对他的启示，而其实这也许正是表现了穆木天一直坚定地试图建构中国“纯诗”诗歌理论的构想与决心。因为当时社会精神的现实需要，以及传统文化的基因、个人精神秉性的原因，他在接受西方理念过程中总会有自己下意识的甄选，因而事实上与西方象征派相比较而言，他的中西结合后的新的象征理论，无疑具有独特的显著的民族精神思想基因，这样的接受过程中西方理念的变异，本身就具有一种美学意义。

他完全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举动，应该说直接引导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鲜明的区分，就此意义而言，《谭诗》无疑具有了中国象征诗理论建构的价值指向，穆木天以法国象征诗派为梳理基点而发出的既联系又独立的对“纯诗”的思考，俨然具有了宝贵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意义，甚至是对中国几千年诗歌观念的深度探索。或者说，一种全新的诗歌价值观因此

而走向形成，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度成为衡量新诗的标尺，正如穆木天精神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样，因为富有强大的感染力，而如此不容置疑。

二

穆木天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更重要的是，穆木天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和诗歌理论上，都为我国新诗提供了重要的新诗文本与新诗研究范本，为我国新诗发展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宝藏。与大多数跨文体的作家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穆木天涉猎的领域虽广，但首先仍是以诗人的身份而为大家所熟知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他在革命的战火、生活的动荡中辗转颠沛、北下南上，却从未放弃文学上的潜心研究与创作，先后出版了几本诗集，其中有今天大家仍然非常喜欢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在诗坛崭露头角开始，到他外出求学，成为象征派诗歌先驱，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走向浪漫主义，可以说，他的个体的文学路径，恰恰就是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行进路径，当然同时也确定了穆木天在象征主义早期由西方向我国文学领域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歌集《旅心》的文本，也因此具有了被不断阐释与解析的命运。1923年到1926年，穆木天在东京帝大攻读法国文学。当时穆木天正值青春韶华，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迷醉，以及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是他生命中的巨大张力所在，因此他写下了几十首深情而优美的诗，并于1927年收编成册，名为《旅心》。《旅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诗人对祖国和故乡的深切怀念。正如汕头大学文学院著名穆木天研究专家陈方竞在《〈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二）》中所言：“《谭诗》和《旅心》烙印着穆木天留学日本的生命历程，镌刻了穆木天在

日本文化影响下与法国象征诗结缘的根由，展示了中国象征诗最初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尝试。由此可见，‘五四’后的中国新诗观念和创作的象征主义发展，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性质，体现了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①的确，诗集《旅心》无可替代地开拓了中国象征派新诗歌的新天地，诗集中一些诗篇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以及一些诗篇融进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等，以鲜明的情调，传递着个体写作者的情绪。穆木天在与象征派交融的初期，潜意识中意在接通西方现代新诗的交响理论，在极力构建象征世界以外，他还接受异域文化的更多艺术审美启蒙，音乐、色彩等一切给予人心灵悸动的东西。他执着地追求诗的纯粹性，使诗向音乐的本真性靠拢，通过乐感暗示人的精神感知，使诗集《旅心》形成了丰富而多维的艺术风格与美学品质。因此穆木天的诗集《旅心》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考量，均可以定义为一部经典之作，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文本先驱。

1926年，《旅心》的部分诗歌在《创造月刊》发表时，郁达夫在编后记中就称赞：“颇具一种特别的风韵。”1935年，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列出《旅心》全部篇目并赞誉：“此为别创一格者。”这两位著名作家、批评家从客观而开放的审美维度，给予了诗集深入浅出的内涵认可，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因由国家命运所导致的文学悲情，《旅心》一直消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让人痛心而遗憾。令人慰藉的是，近年随着现代诗歌研究领域被不断拓宽，研究姿态的丰盈与开放，这部作品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新诗的福运，更值得我们对此满怀期待，期待这部曾经给中国象征派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的经典，在新时代的阐释中焕发出全新的诗歌生命与美学价值。

同为初期象征派诗人的冯乃超，作为穆木天的好友，曾在为《穆

^① 陈方竞.《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二）[J]. 华文文学，2006（3）：58。

木天诗选》写的序言中提到《旅心》集里的一首小诗《与旅人——在武藏野的道上》，冯乃超认为：“这首诗在结构、语言、韵律上都比较新颖，尤其‘奔’字用得特别生动。‘奔’是追求，诗人有所追求，他‘问遍了点点的村庄’‘问遍了那里的镇市’，然后鼓励自己‘前进，对茫茫的宇宙’‘不要问哪里是欢乐，而哪里是哀愁’。苦难的中国不是敏感的诗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旅人’，抱着一颗流浪的旅心，不断地寻觅什么似的探索着。”^①这样精准的解读，将《旅心》这部浸染了浪漫色彩与超验想象的大野文化的诗作，平添了神秘与悲情。

天下旅人的路一样遥远苍茫，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归宿。作为一个自认是“东北大野的儿子”的诗人，穆木天对故乡的深切眷恋，天地可鉴。辽阔苍茫的东北大野是他感受与探求生命真谛、感知文明与文化的母体。同时旅人的视野亦满怀辽远，因此他的诗歌文本中的大野故土，就无一不反射出一种别样的超验的甚至迷离的新的大野文化。故土乡园，经由作者的思想意识，在诗歌中仿佛重新诞生，一切现实必须经过诗人的想象和超验感受后才会凝结成真正的艺术佳作。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无论身处何地，诗歌创作无非是一个假借体而已，最核心的是将内心被生活与艺术同时雕琢的灵感准确而神奇地呈现。因此，东北大野情结事实上是穆木天生命与精神的双重起点，但于文本中，也许它完全是另一种面貌，而这也许正是诗歌的一种深度美学意义所在。

沿着诗人的精神脉络探索，有的研究者已经发现，诗集《旅心》虽然有着明显的象征主义风格，但仍然可以觅见，其间隐隐的已经向现实主义转化的倾向。直到1937年出版的《流亡者之歌》，以一种全然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新风格，向诗坛向大众展示在时代的行进中一个诗人的精神如何发生了嬗变，以及他的新诗歌的新方向，同时亦昭示

^① 穆立立. 穆木天诗选 [G].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5。

诗人精神世界的巨变。

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说，父亲自称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从了解到理解，穆立立一直深有感怀。20世纪20年代，父亲执着于象征主义诗艺，魂牵梦萦的东北大野故园已然呈现别样面貌；20世纪30年代，战火硝烟中的父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诗风大变，吟出了泣血的“流亡者之歌”。的确，抗战爆发后，他一改往日情怀，以笔为旗发出呐喊，以笔为剑进行搏杀，诞生了许多的新作品，可以说他对诗歌的思考从未停止。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邢富君在接受一次专访时说：“穆木天可以说是以现代诗人的姿态走进中国新文苑的第一个东北人，是东北流亡作家的先驱者，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东北作家的唯一代表。在为‘五四’的春风所唤起的最早一代东北文学青年中，穆木天的创作是最杰出的。”邢富君认为，在穆木天后来的文学活动中，对于法国文学以及其他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26年他开始发表关于法国诗人维尼的长篇评论，次年又翻译纪德的小说《窄门》，以后又持续不断地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写了许多法国文学评论。1935年，他出版了一大卷《法国文学史》。在早期的东北作家和学者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同穆木天的外国文学修养和译介工作成就比肩。爱情从来都是诗歌的核心源泉，穆木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读法国文学期间，遭遇了自己的第一次情感，遗憾的是以失败而结束。这样痛楚的经历，给了诗人写作的最佳语境，他自己后来也曾回忆说：“那种兴奋和刺激，直接造成了我的那些诗歌。”后来穆木天与蒲风、任钧、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穆木天执笔写了《缘起》：“在半殖民地中国，一切都浴在疾风狂雨里，许许多多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第二年，中

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穆木天又写了发刊诗，极力提倡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要新诗成为“大众的歌谣”，还写文章批判唯美主义。穆木天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失去故乡的流亡者，他说：“目睹着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验着‘九一八’的亡国的痛恨，我感到了诗人的社会的任务。”邢富君表示，正是这种使命感激发了穆木天新的诗歌创作，他的诗风也从此开始平白起来，从幻想回到现实，从象征艺术转向政治性呐喊。1942年，穆木天在重庆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新的旅途》。“对于时代的革命热情和对于沦陷故乡的黍离之悲，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内容。”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派诗人先驱，他提出“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要求纯粹的诗的感兴（inspiration），也都包蕴着强调浪漫主义的因素在内”；更指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的，是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①这段至今仍被学界提及的话，提到了一个象征派的重要符号：暗示。事实上，充分运用暗示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是象征诗派极为重要的诗学策略。比如在《苍白的钟声》中：

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 蒙蒙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作者极致而纯粹地将形式与意象上的暗示作用，借钟声的渺渺之

^① 穆木天. 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J]. 创造月刊, 1926 (1).

音，表达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意。诗人以晦暗的情调、沉郁的语言来描绘充满指向的钟声的苍白、朽腐与颓败。诗歌中反复提到的诸如“故乡之歌”“永远的故乡”“朦胧之乡”“苍茫之乡”“古乡之歌”等足以证明，诗人在此要呈现的是对家园大野的深切眷恋与怀想，无限的惆怅触动了诗人的心神，这也正是大多诗句诞生的前提。这是《苏武》：

明月照耀在荒凉的金色沙漠，
明月在北海面上扬着娇娇的素波。
寂寂地对着浮荡的羊群，直立着，
他觉得心中激动了狂涛，怒海，一泻的大河。

一阵的朔风冷冷地在湖上渡过，
一阵的朔风冷冷地吹进了沙漠。
他无力地虚拖着腐烂的节枚，沉默，
许多的诗来在他的唇上，他不能哀歌。

远远的天际上急急地渡过了一片黑影。
啊，谁能告诉他汉胡的胜败，军情？
时时断续着呜咽的，萧凉的胡笳声。

秦王的万里城绝隔了软软的暖风。
他看不见阴山脉，但他忘不了白登。
啊！明月一月一回圆，啊！单于月月点兵。

1925年6月17日

这首诗更加鲜明地将穆木天的诗歌风格尽显其内。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木天是无可争议的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早期引进者和创作实践